國家發展研究　第七卷第一期
2007 年 12 月　頁 69-92

到西方寫中國大歷史：黃仁宇的微觀經驗與美國的中國學社群

孟祥瑞*

收稿日期：2007 年 5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生。感謝台大國發所協助刊登本文，並感謝匿名審稿人所提出的寶貴意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摘要

八〇年代初，黃仁宇遭到解聘以及隨後萬曆十五年付梓暢銷，這段時期可以說是學術生涯的轉捩點，黃仁宇藉由其回憶錄記述了當時心中許多憤懣的情緒，可說是自身的辯白並且闡揚自己的理念的一本書。本文主要藉由閱讀整理黃仁宇作品及其他補充試圖對黃仁宇及其理論做理解與回顧，試圖找出黃仁宇在當代中國學研究中的位置，並且從黃仁宇與中國學社群的對話中，重新檢視當時美國的中國研究社群可能具有的某些問題。

關鍵詞：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美國的中國研究、漢學、西方中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萬曆十五年》儘管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
卻有著卡夫卡超現實的夢幻特質……。

——John Updike[1]

壹、前言

2000 年 1 月 8 日，以《萬曆十五年》一書蜚聲國際的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因心臟病發病逝於紐約，他的一生涉入了許多二次大戰期間中國重要的發展進程，雖然不能主導這些事件的進行，但是他的親身經驗卻讓他在日後以歷史學家作為一個旁觀者時，有了不同的深入視野。二次大戰結束後負笈美國，就讀美國陸軍參謀大學，使他藉由後勤學開始看到美國與中國的不同[2]。而後更在密西根大學取得新聞學學士、碩士以及歷史學博士學位，藉由脫離傳統中國史學方法，他找到了一個試圖外於中國、卻深入理解中國脈絡的史學角度。

但他所沒有想到的是，他以個人經驗、人生哲學融合歷史學訓練所培養的大歷史觀，無論在美國或者中國的學術社群，即使在他因《萬曆十五年》一書聲名鵲起之後，仍然受到質疑[3]。他的國民黨軍官身分，無論在剛踏入美國時或者歸化美籍多年以後，都一直使人無法接受他的中國形象（China image），也不願接受他的中國學其實不是單純充滿民族主義的史觀[4]；在對於中國研究的基本假設上，黃仁宇對傳統學術分科的意見也使他與美國學術界格格不入[5]。諷刺的是，他的大歷史觀在台灣的歷史學術圈也受到批評，王汎森院士評論他的《中國大歷史》指出：「（此

1 John Updike: “The Long and Reluctant Stasis of Wan-Li”，收入黃仁宇，2004《大歷史不會萎縮》，p473。
2 黃仁宇，2001a，pp.128-130。
3 劉紀倫，〈歷史與自由—評黃仁宇的歷史理念〉，《新史學》，13:3，193-240；陳正國，〈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新史學》，14:2，155-192。
4 Ibid，pp.133-138，pp.449-450。
5 Ibid，p322，p5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有時未免做了太過印象化的概括，讀來竟像是一個外國人在描寫中國……」；龔鵬程教授則更尖銳的指出：「技僅止此，便欲綜論上下古今，可乎？」以及「我讀黃先生書，輒為其缺乏中國思想、文學、藝術……之常識所驚。」[6]這些評論雖然不一定能真正反映黃仁宇的中國學的學術價值，但卻正可顯示黃仁宇與中西學術界之間的差距。

黃仁宇通過其自身中國經驗產生了一個中國觀，並且希望能以此作為一個綜觀中國、建立新的中國形象的論述方法，甚至能針對傳統步入現代的歷史斷裂開展一套研究方法，建立尋求聯繫過去與現在的「大歷史」，但在大多的中西學者看來卻既缺乏學術客觀性，又無法通過傳統學門分工下的科學檢驗。

在這樣的嚴重對立的觀點之下，我們該如何理解黃仁宇以及他的中國學？其觀點何來？其中的客觀何在？各種批評從何產生？如何才能在眾多批評下正確的認識他的大歷史？而黃仁宇處在七零年代美國中國研究社群的另一面，其存在又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貳、黃仁宇簡介

一、黃仁宇的近代中國經驗

了解黃仁宇的第一步在於進入他與近代中國的特殊關係，他在自傳中自道：「我恰巧出生在中國政治的最低點……讓我能窺見成形的歷史，據以證實和補充我所閱讀的內容。」[7]然而不僅其所身處的時代，他在時代中所作的選擇，以及其後所帶給他的遭遇，也都有許多不同於常人之處，使他能更接近歷史發展與轉折的關鍵點，讓他有了不同於時人的中

[6] 黃仁宇，2004，pp.47-48。
[7] 黃仁宇，2001a，p2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經驗，而後走出中國，進而發展出這種站在中國之外，卻又能深入剖析中國的史觀。

黃仁宇 1918 年生於湖南長沙。他的父親黃震白來自湖南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年輕時就有濃厚的民族意識，所以自號種甦[8]，曾參與各種國民黨早期活動，清末加入同盟會，考入福建講武堂以便策動新軍，而後勸說許崇智加入同盟會，並且在民國成立後擔任許崇智的參謀長，參與二次革命被捕下獄，險些因此喪失生命，最終對於革命失去了信念，即使在戰友戴愧生的遊說下仍然無動於衷。黃震白在黃仁宇出生的前一年退出革命返回湖南，他在國民黨中的資深經歷，以及與許崇智的關係，使他日後基於道義無法再在南京蔣介石政權下謀職，於是在地方政府從事零星工作，父親的革命經驗帶給黃仁宇的除了年幼的貧窮生活，另外就是父親希望他們兄弟「不要當政客或軍人、更絕對不要當革命黨人」，因為「革命黨人失敗就成為烈士，但革命黨人的領袖成功時就可能成為軍閥。」[9]然而，日本與中國的戰爭在他完成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的學業前爆發，他最終還是與父親取得了協議，在二十歲時放棄已經遷往成都的學業，加入軍校成為國民黨的一份子[10]。除此之外，黃仁宇的父親留給他的，還有對於身分的固執概念，黃仁宇年輕時與父親談及小泉八雲因長期居住日本、喜愛日本文化而入籍時，黃震白驚訝的說「為什麼這樣的英國人會如此的無恥」，即使他後來入籍美國即使問心無愧，內心卻必須感受到必須向已經過世父親解說的必要[11]。

以上種種因素雖然似乎使黃仁宇看起來是個徹頭徹尾的天生國民黨人，但是其實一切對他來說，偶然因素的成份大於一切。他在 1938 年從

8 黃仁宇，1988，pp.225-226。其中也指出，黃震白的革命資歷除了黃仁宇從其父口中得知，也曾在東京由戴愧生告知部份。

9 黃仁宇，2001a，pp.245-251。

10 黃震白雖然不希望兒子加入國民黨，但並非全然對民族及國家漠不關心，在黃仁宇兄弟前往從軍時，他表示：「這場戰爭我們絕對不能輸」。參見黃仁宇，2001a，p252。

11 黃仁宇，1988，pp.227-2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軍前因為在長沙的《抗戰日報》工作而與廖沫沙成為室友、結交范長江，甚至認識了田漢，在身邊許多朋友遊說加入共產黨的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想見共產黨對他也當然會是一個選項，而事實上也是如此。但黃仁宇之所以選擇成為國民黨軍官，不是偉大的意識形態或者家庭背景等其他因素，不選擇共產黨只是單純因為「……他們教的是游擊戰，並不合我的胃口。」[12]，在這樣的時代中，「……個人只能默默接受他們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而多數人是由個性和偶然際遇來決定站在哪一邊。」[13]

而後黃仁宇前往成都中央軍校受訓，擔任排長派駐雲南邊界，這段生活使他了解儘管是配備精良的國民黨士兵，在內地也「必須在明朝的生活條件下過活。」[14]「不只在後勤補給上遠遠稱不上現代，軍官即使充滿新式戰術訓練滿腔熱血，卻也不得不承認仍是赤足士兵的價值觀佔了上風」[15]，「我們畢業生一下部隊也發覺士兵談不上訓練。我們只要他們不在淫雨與瘧疾威脅下被拖倒病死，較狡猾的軍士不把機關槍黑夜偷出賣與土匪，已屬萬幸」[16]，上述案例顯現出現代化的軍隊派駐在中國內陸本身就具有矛盾的特質，在逃亡與醫療不良不斷發生下，補充後的士兵更是令人感到荒唐，有的不僅無法溝通，甚至生理心智上都無法訓練，當黃仁宇想要改變他們的性格進行訓練時，他的副官賴中尉大罵他：「你們這些軍校來的人老是自以為是！想把這種人改造成軍人？門都沒有！[17]」但是在中國內陸的生活情形下，加上缺乏現代化的徵兵制度，所徵得的士兵不僅不足額，難以訓練，根本難以作為現代化部隊的基礎。

1941 年黃仁宇因父親過世返鄉，重返軍隊後先擔任文職，後來被擔任鄭洞國將軍的參謀並被派往印度，負責設立新一軍的總部，因而有機會初次接觸英美等外國士兵，並且對史迪威留下印象。結訓後參與駐印

[12] 黃仁宇，2004，p2。
[13] 黃仁宇，2001a，p224。
[14] Ibid，p10。
[15] 黃仁宇，2004，p370，p402。
[16] 黃仁宇，1991a，pp.92-98。
[17] 黃仁宇，2001a，pp13-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軍作戰，轉戰滇緬各地，甚至跟隨第十四航空隊執行轟炸任務，種種「英勇」的戰績雖然都以兼任戰地記者的身分刊載於大公報，並集結為《緬北之戰》一書，但是同樣一幅描寫陣亡日軍上尉的場景，在報上只是輕描淡寫[18]，卻在回憶錄中帶給他諸多感傷，察覺敵我之間過去人生的差距之細微，影響彼此者可能只是因為被放在了這樣的位置上，而嘆人生偶然與無常[19]。戰後的經濟失序、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戰爭，連同以往的經驗，都以不同面向讓黃仁宇看到了中國現有的機構不足以處理當前所面對的問題，國民黨的政府結構雖然已經有了改善，但是卻如同現代化的軍隊，無法得到社會結構的支持，即使有了西化的結構，但內陸仍然極度落後，就算能有現金或者各種援助，因為缺乏分配的管道，事實上也只是造成無法消化的困難[20]。

黃仁宇的近代中國經驗可說是與二次大戰緊密結合，這次戰爭不僅為他開啟了日後前往美國的契機，也以親身經歷證實了大部分的中國距離現代有多遠，以及改革如何受到中國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所制約，不僅社會中缺乏溝通與連結的制度，甚至包容軍閥以及大量士兵的犧牲也都是運作當時社會必需的手段，於是當然不能通過現代化工業社會的檢視標準[21]。隨時瀕臨死亡的戰爭以及內戰中的矛盾更讓他有了命運預定論的哲學思考方向，人的命運中有許多的事件在不可知中主導著一切，一個人雖然能夠作為自己命運的主宰，但往往無法看出在長遠的眼光下這樣的行為會有什麼樣的影響，選擇不僅有限，而且往往已經在歷史發展的脈絡上註定了[22]。以上種種經驗雖然看似不起眼而零碎，但卻如同這些事件影響他的人生觀一般，在後來影響了他在學術研究上的認識，進而構成拼湊出他的中國大歷史的一塊拼圖，成為其中不可忽視的特色

[18] 黃仁宇，2006，p47。
[19] 黃仁宇，2001a，pp.47-48。
[20] Ibid，p256。
[21] Ibid，pp232-236。
[22] Ibid，pp.238-2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一。於是這樣的特色雖然在黃仁宇的學術著作中表現較不清楚，但是在講述其中國認識的概念形成時，他所列舉的例子，除了其專長的明朝中國外，大多都來自於早年的國民黨軍旅生涯。

二、黃仁宇、美國

戰爭結束後，黃仁宇重新思考了未來的人生規劃，戰爭的硝煙漸退，軍人的身分已經被混亂的國內狀況蓋過，更糟的是，隨著國共關係的日漸緊張，於是他身在東北前線杜聿明麾下見識了國共內戰的序幕[23]，在 1946 年通過考選前往美國陸軍參謀大學受訓，歸國後就任文職，1949 年就任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的隨從副官，並曾代贈蔣介石給予麥克阿瑟的祝壽禮，因此得以親身與麥克阿瑟交談。但朱世明隨後因葉山會議事件不得已而被召回，黃仁宇則在此時與其一同退役，隨朱世明短暫返國後從日本直接前往美國攻讀學位。[24]

赴美後的黃仁宇遇到了重新定位自我的問題。在密西根的教授或同學，對於其曾任國民黨軍官的身分更加敏感，使其必須思考如何回應對於國民黨貪污無能造成內戰失敗的指控，美國雖然給了國民黨號稱二十億美金的補助，但是軍隊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裝備和補給，武器等散置於無關緊要之地，黃仁宇舉出以下例子，1946 年時整個東北的一〇五釐米榴彈砲不超過一千發，幾分鐘就會發射殆盡；補助中也包括美國軍事顧問團的開銷，其金額可以養活二十五個中國師級部隊，問題也正如他所

[23] 關於這段經驗，黃仁宇曾在 1958 年五月號的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中發表文章 “Some Observations on Manchuria in the Balance, Early 1946”回應美國前駐瀋陽總領事 O. Edmund Clubb 的文章，以身為代理司令鄭洞國參謀的身分回應其中某些對國民黨軍隊與指揮的指控。

[24] 關於此事件本末，黃仁宇描述中將其視為不單純而可能帶有陰謀或官場鬥爭的性質，而對此他也曾經困擾自己的未來是否會受影響，但據其事後得自軍校同學的消息，其退役「完全合乎規定」而記錄上備註：「該軍官應永遠不在委任或聘用」，對此黃表示鬆了一口氣。參見《黃河青山》p152~171。此事件是否影響其後赴美研究甚至歸化美籍等則在各書中均無提及，但據其所述，重返校園是其自戰後便有思考的出路之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兩國的體質相差太遠，直接輸血會帶來很大的問題。其實雙方都很無知……」[25]。他碰到旁人的指控，有時採取了身在其中的回應，如在不斷面對貪污無能的指控時，他說：「我不曾否認國民黨的貪污腐化，我只希望指出，貪污是失敗的結果，不是原因。」黃仁宇指出他對中國的辯護不是出自一種驕傲，而是對於既存社會結構無法改變的痛心，並且在認知到這樣的前提之下，希望提出一個中國能夠被理解以及讓中國自我調適的空間[26]。

在美國的生活中，除了持續不斷對上述指控進行辯護之外，融入美國生活也是黃仁宇所面為的重大問題。無法以英語進行交談與寫作不僅使他放棄了新聞學的訓練，轉而走向歷史學[27]，而在往後的學術寫作中，他也因為無法完全掌握英文而受到批評「……因為我必須以自己完全無法掌控的語言來書寫，批評家可以輕易指證我模仿笨拙，思想膚淺……」。[28]另一個在美國的問題則是維持生計的問題，就我們的資料來看，黃仁宇早年生活未成年前則依賴家中，而後則大多時間花費在軍旅生活中，自謀生計的時間不多，然而負笈美國期間，所有費用都必須自籌，時年已三十四歲，卻在各種打工之中屢屢遭遇挫折，無論是語言溝通或者是對於許多生活基本常識，甚至中年打工者身分本身都是一種困擾：「即使我有自己的價值觀，以外在的判斷來看，我的自尊也不可能永遠不動搖。害怕失敗的感覺一直存在，有時很想放棄長期以來的奮鬥，因為這種奮鬥似乎漫無終點。」但是「我發現以勞力賺錢會產生一定的滿足感……還可以打破孤寂的感覺。我的自由感與樂觀主義來自於我的自給自足……我就無法在中國有這樣的經歷」[29]其入境美國時無所依憑的焦慮，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在此都可以看出；然而黃仁宇在其中所

[25] 黃仁宇，2001a，pp.135-138。
[26] Ibid，pp.451-452。
[27] Ibid，pp.125-126，他轉向歷史的原因正是因為前面所提及的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上所刊登的文章。
[28] Ibid，p70。
[29] Ibid，p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將勞力轉換為現金的經歷，是在中國所無法經歷的，這樣的經驗也成為他往後中國形象中很重要的一部份，也就是傳統社會中勞力無法有效流動問題。

之後他歸化為美國公民，不僅使他心理上感到有違父親的觀念，在安亞堡期間也曾收到田漢的信件，其中「婉轉暗示我身為變節者的尷尬地位」[30]。由他在書中所描述的心情來看，他自知確實受到田漢的諸多幫助，因此對於此種關心當然能夠接受，在心中對於自我的身分認定，雖然不斷的藉由回答類似的問題而自我肯定，但是其中對於周遭的眼光的不安，卻因此而更顯得明顯。

三、黃仁宇著述

黃仁宇自從發表萬曆十五年以後，成為華文史學界最暢銷的作家之一。他最早的作品是發表於報紙而後蒐集成書的戰地文學《緬北之戰》（1946），而後他的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於 1964 年發表，而後曾參與編寫《明代名人傳》、《劍橋中國史》並協助李約瑟進行《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研究，兩人並且共同發表了「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31]一文，這次前後超過十年的合作經驗給予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很多啟發，並且日後黃仁宇也時常引述文中與合作時所產得到的概念，作為其大歷史觀點的基石[32]。在這段期間中，他得到費正清與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的贊助，而得以完成《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然而在出版上幾經波折，最後本書並未依計畫收入《哈佛東亞研究叢書》，改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隨後黃仁宇在美國的的學

[30] Ibid，p197。
[31] Needham, Joseph and Huang, Ray,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Hong Kong), 12:1-2(1974), pp. 1-16; East and West (Rome), New Series, 24:3-4 (1974), pp.381-401.
[32] 黃仁宇，1988，pp.93-109。另外可見黃仁宇〈李約瑟給我的影響〉，原刊載於《歷史月刊》，88:102-113，亦收錄於黃仁宇《關係千萬重》，pp.37-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術生涯並不順遂，除了《中國並不神祕》多次被拒絕，以致這本書至今未能出版，他也在 1979 到 80 年間被紐約州立大學解聘。

黃仁宇的代表作《萬曆十五年》一書的出版也經過諸多質疑，「商業性的書商認為這本書應該交由大學出版社，而大學出社認為我應該去找專業的書商……稿子不是以學術論文的傳統形式寫成的……形式比內容更重要。」[33]，原本希望兩者能成為相輔相成的教科書的《中國並不神祕》以及《萬曆十五年》最終都多經波折[34]，而只有後者得以由耶魯大學出版。然而隨著《萬曆十五年》出版成為暢銷書，並且廣獲好評[35]，卻已無法挽回他被解聘的遺憾。而後黃仁宇在華文出版界聲明大噪，而陸續出版了眾多書籍，包括較為學術的論文集《放寬歷史的視界》，成為某些美國學校教科書的《中國大歷史》[36]，重新定義資本主義以及檢視中西發展的《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評定蔣介石歷史定位的《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37]，關於歷史的短篇文集《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以及其他較不符合學術體例的文集《地北天南敘古今》、《近代中國的出路》、《關係千萬重》、《新時代的歷史觀：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大歷史不會萎縮》等；黃仁宇也曾經以李尉昂的筆名出版《長沙白茉莉》以及《汴京殘夢》兩本小說，他的回憶錄則雖然完成於 1983，但聲明必須死後才將書稿交給出版社，隨後於 2001 年成書。從上述書目中我們可以看到，黃仁宇在八〇年代初期，萬曆十五年出版後，大多數發表的文章都較接近綜述，而較少符合學術體例的著作，《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一書雖然體例上符合，但是以一本約五百頁的專書，論述威尼斯、荷蘭、英國等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日本、德國等改進後進入資本主義的國家，以及法國、俄國、中國等歷經革命才進入資本主義的國家，並且

[33] 黃仁宇，2001a，pp.82-85。
[34] Ibid，p499。
[35] Ibid，p591, p596。
[36] 黃仁宇，2004，p48。
[37] 他在書中自稱因資料殘缺，無從做有系統之注釋，如有需要只能以後再出學院版。參見黃仁宇，1994b，p4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要重新建立資本主義的體系，這樣的負擔似乎過重，並且對於西方學術界而言，黃仁宇好像也不具有論述這麼大的問題的可信度（credibility）。

參、黃仁宇的中國與哲學觀

黃仁宇的哲學觀影響了他史學研究的認識，而這點也受到台灣史學界一些學者的批評，但與其說他接受了一整套的西方命定論、目的論，不如說他的經驗與這些觀點契合。因此我們在此藉由他所受到的批評作為引介，試圖重新建構他的哲學觀中重要概念的發展。

在對於黃仁宇的哲學觀的批評中，最顯著的一點就是針對他的史學中的目的論。陳正國教授指出黃仁宇的歷史寫作中，在萬曆十五年出版之前的現代化論述較不明顯，而後則「以歷史主義的同情看待傳統，卻又以目的論的語言寫作現代史」[38]。劉季倫教授以黃的舅舅因共黨身分被處決，更深刻的指出黃仁宇「不肯去檢討歷史中的個人」「……如何試著盡力去擺脫種種限制與束縛……都不再是他著重的問題」他終於得到了一個結論：這一切『犧牲』……從『長期』的角度來看，是『合理』的」，認為黃因為目睹了國共之間的慘劇，必須解釋這些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於是他提出了歷史的長期合理性，並且認為歷史的發展力量來自於全意志（general will），而劉教授所批評的正是這種把個人當作歷史經紀人（agent）的目的論[39]，因此削弱了人類當下生存的重要，也減少了人作為個體、自我的自由的意義，讓人似乎成為歷史中的藍螞蟻，所從事的努力難以反映出歷史的真正軌跡，而隨時可能為了外在不可知的目標剝奪個人的一切。

除了上述批評確實指出目的論的預設與限制，也可以把黃仁宇的史學哲學觀依照其脈絡進行推演，看到目的論的痕跡，然而，他在接受訪

[38] 陳正國，2001，pp.156-162。
[39] 劉季倫，20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談中就曾經親自談到：「批評我的書……第二種說我是目的論，我寫書沒有那麼大的眼光……我是很實際的，並沒有說一個社會一定變成怎麼樣，我是根據自己的人生經驗和歷史知識，覺得中國正朝著這個方向走……。」[40]然而，在黃仁宇的辯白與學者對他的指控之間，要如何去理解這樣的解讀上的差異呢？

在前面的生平簡介中可以看到，黃仁宇體會到一個人的眼光與選擇具有許多限制，所以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相逢與相互角色關係大多都屬偶然，並且很難有真正超越思慮能及的長遠眼光，甚至所作的選擇由結果來看，可能根本不是原本所想像的。例如他自己在國共兩黨之間的選擇指引他後來遠走海外，而國民黨的身分又在日後飽受質疑，這些是他當日選擇時所看不到的。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相較於外在存在的巨大社會結構，個人的能力所及能改變的極少，即使蔣介石也無法立刻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而在起初必須與軍閥妥協，且日後與各種傳統政治社會結構妥協，以求在全國統一的基礎上尋求改革[41]。至於黃仁宇自身的經驗，作為軍官的他在統御部隊時也不得不與傳統的群眾心態妥協，而無法以有紀律的軍事指揮行事。黃仁宇說：「在大陸時代的動亂中，很少人能對前途做徹底的打算……只有在最後時局穩定中，才能將前後的來因去果，看得清楚。因此更嘆歷史的發展，有他的規律。與之相較，個人不僅力量微薄，其所觀察，也難以衡量全局。」[42]這雖然仍然很接近目的論的色彩，但在其中對於人類能力持謙虛懷疑的人本色彩，則遠遠大過了科學式必然性發展的強調；其中不必然是對於人的自由意志的漠視，而是由自身經驗外放出一種以肯定人的自由意志為先決條件，進一步強調人的選擇在結構限制中最後所共構的結果，一方面有道德與社會價值等正向拉力，但另一方面則有環境和歷史因素的拉力，

[40] 黃仁宇，2004，p435。
[41] 黃仁宇，2004，pp.121-127。
[42] Ibid，pp.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者代表人類過去所犯的錯誤，歷史的真實路徑則介於兩方面之間。[43]所以縱令人類在其中受到限制，但卻未必只是歷史的傀儡，而是當歷史人物引領走向改革時，都必須背負著重重環境的結構與歷史的過去。

正如前面曾經提到的，黃仁宇生活在中國走向轉型的一個重要時期，這種劇烈變動的環境使他必須發展出一個全面的人生哲學以解釋他的各種經歷，為什麼這些不良的組織在眾人合力下仍然難以轉變、為什麼令他尊敬的才智之士選擇截然不同的立場使雙方站在歷史的對立面？要解答這樣的問題，答案很顯然不應全是任何一方的思慮不周，而是處在歷史的洪流中，一個人的力量與視野都不足以扭轉全局，當一個人試圖以超越所處的社會的時代進行改革，而不顧一切既存的社會結構問題，那麼這樣的行為，黃仁宇筆下不斷提及王安石與張居正的改革[44]，改革不僅無法帶來振興，而往往有毀滅性的效果。黃仁宇哲學觀的產生，可以說是先由個人困於社會結構而生，而後在歷史中找到了這種效率低落的政治結構的根源，他在建構認識體系的過程中，與其說試圖找尋未來的必然，不如說是為了理解過去的歷史，並放下過去的包袱往前邁進，而在這樣的過程中，黃仁宇或許解答了自己以往困惑的某些生命意義。

肆、黃仁宇的史學發展脈絡

從前面所介紹的黃仁宇的早年生活中，我們看到了他的生活經驗如何對他的中國認識以及哲學觀造成了影響，他的中國經驗直接的與近代中國的發展相連結，因此在他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時時看到他的著眼點是與他的自身經驗十分接近的。黃仁宇處在中國歷史的轉折之上，出身於傳統社會而受近代西方管理上的長處所刺激，決心想要以自身的努力改變中國社會，並且為自己鋪上廣闊的大道，通往一個功成名就的未

[43] 黃仁宇，2001a，p575。
[44] 黃仁宇，1993，pp.163-170，pp243-250；黃仁宇，1989，pp.242-2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45]。但是當他有機會接觸中國內陸農村時，他卻發現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根本不容他做出任何改變，雙方的認知差距已經大到無法彌補，甚至想要讓自身的行動能產生意義，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觀點退化，進入前現代的生活，才能夠處理一切的問題，即使在高如師長的階級也不例外。比如，他們從來只有一套軍服，當司令部終於撥下足夠款項製作軍服，內陸卻沒有足夠的供貨商提供布料等，所以後勤官必須前往越南採買白色布料，自行尋找染色、剪裁工人之後，才有辦法給予士兵一套替代的軍服[46]。

這樣的故事說明了為什麼他會說，不同體制下輸血難以發生意義，也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為何在中美雙方互相了解的過程中，雙方在深層的溝通上根本缺乏對話與理解的平台。如何解釋這樣的問題必定困擾了黃仁宇很久，在最早期關於戰後東北的著作中，他對於國民黨的失敗就還仍然偏向戰術層面的解釋，而無法深層探究國民黨為何無法取得成功。一直到後來他引進研究領域外的個人經驗與宏觀視野結合，才解釋了中國與近代化的格格不入。

黃仁宇的史學研究開始於他的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其中研究了大運河對於明代中國的影響，而出乎一般學者所預料的，他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大運河雖然帶給中國南北運輸一定的便利，但是這方面的效益很少能擴及平民，因為對於明朝而言，他所重視的是社會的穩定性而不是發展；另外，國家在以運河為工具以達成許多中央所需的資源運輸時，事實上並沒有考慮成本，以致運輸不經濟，加上其他種種因素，使運河有限的便利性反而限制了明朝可能的發展方向[47]。在此，黃仁宇的大歷史雖然還沒有完全成形，但是卻已經看出傳統社會中的流通問題所造成的不良影響，而更大的癥結所在是：流通的問題對於傳統中國的官僚體系來說，根本就不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反而更可能是明太

[45] 黃仁宇，2001a，p7。
[46] Ibid，p14。
[47] 黃仁宇，2005，pp.226-2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祖以降，有心抑制民間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在此時黃仁宇的中國認識仍然是屬於較為貼近中國的，他關切明朝政府在財政體制上的支離破碎，而他在當時所得到的結論是：官僚體制基於思想上的限制不願意改變成為一個以獲利為導向的社會，政府雖然願意給予民眾基本生活的保障，但是不願意追求私利造成道德淪喪[48]。此時的黃仁宇雖然有了一個暫時性的答案，而這樣的答案並沒有超出華語的歷史研究社群能接受的範圍，但是以後續的發展來看，顯然還不能滿足黃仁宇對於今日中國問題的追問，必經關於流通的分析雖然解釋了他在史學研究中的學術問題，仍然無法解釋為何現代中國經驗與西方無法溝通的困惑。

黃仁宇的史學來自於自身的中國經驗所塑造的中國形象，而後與他所受到的史學訓練結合，因此而成形的大歷史主要可以由以下幾個特徵描述：

1. 大歷史史觀主張把歷史的基點往前推，以理解歷史事件為何以我們所看到的方式發生，在事件發生的當時，即使看似手握大權的人也不可能真正看清他的行為所帶來的影響，甚至在社會結構與歷史文化脈絡的限制下，他的選擇極為有限，而缺乏自由。他把這樣的觀點比喻為一個長隧道，即使窮盡一個人的一生也無法看透，所以必須把歷史的眼光拉長，才能看出其脈絡[49]。
2. 社會結構可分為上層與下層，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差別除了在於上下層結構構造以外，更在於能否以中層的法律與技術聯繫達成上下有效的互動與交流，甚至是達到所有物品甚至勞力都能自由流動與交易的數字上的管理，一國若是能夠達成這樣的程度，則政府只需要注重金融貨幣政策，就能夠大致掌握全民了[50]。
3. 數字上的管理，也就是進入資本主義管理的時代，共有以下三個特徵：資金廣泛的流通、經理人才不分親疏的雇用使經理與所有

[48] Ibid，pp.231-232。
[49] 黃仁宇，1985，pp.329。
[50] 黃仁宇，2004，pp.230-2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權分離、技術上因素的全盤運用，例如交通、通信、銀行、保險等。而他指出這些因素的開展有賴法律與產權在背後的運作[51]。

4. 另外就是研讀歷史時所謂的技術辯證，也就是不對歷史人物採取道德上的批評，因為那只會簡化問題，而無法協助我們了解問題，而歷史更不是傳記體，所以應該以不同於對個人描述的眼光，從較大的角度去理解歷史發展的脈絡[52]。

伍、黃仁宇的史學與西方

黃仁宇的中國學內在發展脈絡和他的中國經驗相互結合，相互佐證；對外，他重新檢視過去生活方式，並且合理解釋各種現象以回應外在質疑，雖然其中有自我辯護，但是並不是毫無道理的自我合理化，而是融合了自我的哲學觀點以及中國經驗後，納入一個從中國之外檢視中國的方式，試圖使傳統中國能夠和變更中的近代中國對話的過程，黃仁宇要做的不僅是把轉變中的中國平移進入西方的脈絡，更把歷史往前推，使雙方能夠在更長的歷史脈絡下互相理解並且進行溝通。

在與西方的學術社群進行對話時，產生了如下許多問題：

1. 論述的客觀性：對於某些美國學者而言，他的論述動機被認為是一個前國民黨軍官，試圖藉著這樣的論述，對於自身貪污腐敗的缺點進行辯解，並且強化自身的道德正當性，甚至有如中國遊說團，是帶有利益特殊背景以及特殊目的試圖打入美國社群的[53]。雖然這樣的質疑不會是所有的美國學者所共享，但是身為中國人以及歸化後的華裔身分，民族主義的標籤始終難以與他完全脫離。

[51] 黃仁宇，2004，p140。
[52] 黃仁宇，1991b，p472。
[53] 黃仁宇，2001a，pp.132-139，pp.449-4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關於學門分科的問題：黃仁宇早年雖然以研究明朝財政史為起點，但是對他而言，如果單純以現代學院內的學術分科來分析中國，根本無法得到真正的中國形象，而只是對於某些中國資料無意義的堆砌，顯示出作者的不負責，因為這樣的學科分工並不能反映出政治組織的結構與程序。例如費正清將黃仁宇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送交經濟學專家 Dwight Perkins 審查時，雙方即對於如何寫作財政史以及是否應該以計量經濟學分析明朝中國意見分歧，對黃仁宇而言，這樣的研究並不屬於經濟歷史，而更像是一般歷史[54]。
3. 同時他也對當時史學研究社群中，所有學者競相選擇微觀的研究分析而提出批評，「我並不欣賞將中國歷史切塊切片，卻沒有事先預想到如何還原為整體。」而他也承認，這樣的觀點成為「我和同行和諧共事的最大障礙。[55]」而他所遭受的最大批評之一，也就是他的大歷史試圖解決太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對其他學者而言是遠遠超出他自己的專長領域範疇的[56]。黃仁宇的這種觀點與他的哲學觀息息相關，在學術分科以及問題的宏觀與微觀上，黃仁宇認為這些問題在整個社會結構上是彼此連結的，假如在對於整體的中國沒有全面的認識時，就試圖片面的解決某些微觀層次的問題，那麼中國既存的史料反而可能成為誤導性的因素，例如明朝官馬由民間養殖，在《太宗實錄》上雖然記錄有每年的數字，但是其中的數字並非實際統計，而是官方以預定的繁殖率計算[57]，若是不考慮實際情形而以此進行經濟研究，則可說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

[54] Ibid，pp.307-310。
[55] Ibid，p560。
[56] 例如黃仁宇的《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一書，以及他在往後所發表的各種文章中，對於中東伊斯蘭國家、印度等國的發展提出己見，我們都可以看出，黃仁宇的大歷史觀至此，已經難以得到傳統的歷史研究社群的接受，因為其所推廣的可說是對於基本哲學觀、方法論上完全不同的一種觀點了，而正如其自己所知，他在微觀研究上的基礎尚未替他建立一個具有足夠學術威望的地位。
[57] 黃仁宇，1988，pp.58-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 解聘風波：黃仁宇與中國學社群的對話，除了上述問題之外，他遭到解聘也代表了美國中國學熱潮在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末的消退，除了得到的資助減少之外，學校與美國學生是否願意深入認識中國、甚至寧可接受淺薄而可能錯誤的認識，是其中更重要的問題。在他得到紐約州立大學聘雇時，該校採行了以學生人數乘以學分數後，平均分擔教學職責給予教師並且評鑑的 FTE 制，黃仁宇在失去了原本定為大學部必修的「亞洲文明導讀」後，FTE 評分上就顯得居於弱勢，而學生們對於學習中國不僅興趣淺薄，認識也往往有錯誤，不景氣以及中國學教職的飽和也是另一個影響的重要因素。[58]但黃仁宇指出的問題中最令人感到一針見血的是：「我被解聘時，是紐普茲唯一教授中國歷史和日本歷史的老師……留在紐普茲校園的，是十三位全職的歷史系教師，全部都教美國史、加拿大史、和西歐歷史」[59]雖然他曾經想以訴訟揭穿解雇背後的政治陰謀，但最終仍然無法找到足夠的同事為他作證而作罷。[60]

陸、結論：黃仁宇帶給我們的反思

黃仁宇的中國經驗、中國學以及他與西方學術社群的衝突，不僅反映了他的特殊國民黨身分與華裔身分進入美國學術社群時的不適應，更紀錄了一個從學術社群外進入學術社群時，產生適應不良而必須有所調適的過程。黃仁宇選擇了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而把往後的取向由學術轉向對於大眾的基本史觀概念的改造，這反應了一個人在面對牢固的學術社群時如何進行反抗，也因此尖銳的反映出了該學術社群當時所具有的矛盾。

[58] 黃仁宇，2001a，pp.473-479。
[59] 黃仁宇，2001a，p81。
[60] Ibid，pp.96-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持平而言，黃仁宇的歷史觀並非單純的為自我辯解或者民族主義取向，而是試圖彌補中西方歷史交會時彼此無法調和過去的狀況，儘管某種程度上似乎仍然隱含轉向「現代化」的必然，但是以所身處的時代以及所面臨的困境而言，資本主義化似乎仍然是當時比較能廣為接受的一個解決之道，正如黃仁宇的歷史觀，後人對於即使有所結論，也只是對於他的觀點與人生片面簡化而得來。對於黃仁宇，如何開展他的歷史觀與西方中國史學的對話，才是值得後人注意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專書

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台北：允晨，1988。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台北市：時報文化，1989。
黃仁宇，《地北天南敘古今》，台北市：聯經，1991a。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台北市：聯經，1991b。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台北市：聯經，1993。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台北：台灣食貨，1994a（增訂二版）。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北市：時報文化，1994b。
黃仁宇，《近代中國的出路》，台北市：聯經，1995。
黃仁宇，《關係千萬重》，台北市：時報文化，1998。
黃仁宇，《新時代的歷史觀：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台北市：台灣商務，1998b。
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台北市：聯經，2001a。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台北市：聯經，2001b。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台北市：聯經，2004。
黃仁宇，《明代的漕運》，北京：新星，2005。
黃仁宇，《緬北之戰》，台北市：聯經，2006。
李尉昂著，宋碧雲譯，《長沙白茉莉》，台北市：時報文化，1990。
李尉昂，《汴京殘夢》，台北市：聯經，19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期刊論文

陳正國，〈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新史學》，12：2，pp.155-192。

劉季倫，〈歷史與自由—評黃仁宇的歷史理念〉，《新史學》，13：3，pp.193-2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onstructing Chinese Macro-history in the West: Ray Huang's Micro-observation and the US China Studies Community

Hsiang-Jui Me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80's, Ray Huang lost from his tenure and professorship a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New Paltz Branch. However, shortly after that, his masterpiece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was published and widely received positive reviews. The period turned out to be the turning point of his academic career. His memoir, which he started composing the draft then, had on the on hand reflected his upset feelings at the moment, and it had also on the other hand served as his last protest against the China Studies Community i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at the same time conveyed his theorization model of Chinese history. By means of conducting a survey on Huang's major publication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ome papers on him, the article strives to construct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n Huang and his theory and thus relocating Huang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fiel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ang and the field, the article seeks to explore the latent problems rooted in the post-war China studies community in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Keywords: Ray Huang, Chinese Macro-history, US China Studies, Sinology, western cente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